



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

(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013028450

D239
30
V2 2013

耀邦同志题签

回忆与研究



(下)

2013
30
13
2013



北航

C1634883

目 录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	347
一、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347
二、西工委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	348
三、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	353
四、组织少数民族的抗日救国团体	354
五、交流和促进民族文化	356
六、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	358
七、陕甘宁边区是全国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359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363
一、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363
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364
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	367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	383
一、毛泽东的嘱咐	383
二、精兵简政	384
三、审干和“抢救”	392
四、政权建设	397
五、自力更生，建设边区	413
六、文化教育	436

七、土地改革	454
八、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	463
附件一：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1944年6月）	468
附件二：罗迈秘书长的谈话	476
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	481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党的方针	481
二、重庆谈判	482
三、旧政治协商会议	485
四、第三方面的表现	487
五、中央派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	488
六、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破坏政协决议	491
七、六月停战谈判	492
八、美帝国主义者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493
九、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残酷镇压	494
十、在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	495
十一、十月谈判，争取教育第三方面	498
十二、谈判破裂，胜利返回延安	502
真假和谈的斗争——记北平和谈	504
一、美蒋策划假和谈阴谋 我党的基本方针	504
二、李宗仁的“谋和”活动 我党的斗争策略	508
三、北平谈判	511
四、争取南京代表团的工作	514
五、和谈斗争的成果	516
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	518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任务和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 方针	520
二、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努力	547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和基本经验	566
四、过渡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组织	606
五、过渡时期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工作	623
六、1956年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630
七、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641
八、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的三年 (1960年—1962年)	665
九、两场错误的批判(1962年、1964年)	682
附件：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意见	704
编者的话	708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

一、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并且可能团结国内一切少数民族共同奋斗。西北（包括内蒙古）是蒙、回、藏、维吾尔等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党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为了阻止敌寇进入西北，并在西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极其注意争取和团结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初到陕北即成立以争取蒙族和回族为目标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

1937年7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高岗任书记，赵通儒为秘书长。定边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蒙古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

1937年8月，党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我根据定边工委在蒙古民族和回回民族中工作的初步经验，也在会上就少数民族工作问题作了发言，分别讲了在这两个民族工作中需要注意和掌握的若干政策界限。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几个中央工作委员会分担党中央的部分工作，其中有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主持西北地区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工委）成立于1939年初，书记由洛甫兼，我是秘书长。委员中我现在记得的有洛甫、李富春、王若飞、邓发、高岗、贾拓夫、陈铁铮（孔原）和我，共十几个人。洛甫不管具体事，实际工作是我从陕北公学分校返回延安后开始的，日常事务由我和贾

拓夫负责处理，重要的问题向洛甫报告请示。西工委的工作人员有：刘春、牙含章（马尔撒）、张光天、刘庚、何承华、何长庆、周仁山、王铎、朱侠夫（塞农）、孔飞、谷敬、秦毅、陈洪、郑义、沈遐熙、谢华等。

1941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特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陈正人、肖劲光等七同志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二同志为候补委员，高岗同志为书记。”从此，西工委撤销，原有工作人员基本上合并到了西北中央局。

二、西工委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

我们党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历史已经很久，但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则是从西工委开始的。

（一）设立研究机构

为了加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西工委专门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少数民族，重点是对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有直接影响的蒙古和回回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为党中央制订民族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民族问题研究室由刘春负责，下设两个研究组：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牙含章、秦毅、朱侠夫等参加；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王铎、孔飞、周仁山等参加。

当时研究工作的条件是十分困难的。手头只有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或参考书，连笔墨纸张也十分缺乏。参加工作的同志，多数未接触过民族问题。开始研究时，请何干之拟了一个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大纲。为了搜集资料，特派刘春去西安。刘春在西安跑遍了所有书店，只要是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书刊和资料，都买。

我们还把毛泽东有关民族问题的几本藏书也借来了，虽然为数仍然很少，但在延安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资料室了。

除了搜集文字资料以外，我们还组织实地考察，进行调查研究。1939年五六月间，派王铎等去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七个旗考察，同年10月回延安。1940年5月，派孔飞等去绥远土默特旗（敌占区）考察，于1941年4月，招收了近三十名蒙、汉学员（其中汉族三至五名）回延安。1940年12月初，西工委和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联合组成“蒙古文化考察团”，由王铎、焦心河率领，赴绥蒙一带考察蒙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同年12月13日，又组成三个回民巡视团，由金浪白、马文良等率领，分别去关中、陇东、三边等地考察。这些对了解抗战实际，搜集资料，招收少数民族学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都是很重要的。马文良领导的去三边的一路，由于接近国民党统治区，马文良等不幸被马鸿逵部捕去，马文良忠贞不屈，惨遭杀害。

（二）取得研究成果

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一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其中《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两本书是大家集体研究，由刘春执笔编写的。前一本当时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后一本直至抗战胜利后在张家口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这两本小册子系统地研究了回回和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党团结回回、蒙古民族共同抗日建国的政策。贾拓夫等编写的《抗战中的陕西》、何承华等编写的《抗战中的甘宁青》（上、下册）、《抗战中的绥远》等小册子，介绍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和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出版。这些小册子，对于我们现在研究抗日战争和民族问题仍有参考价值。

二是为中央起草了两个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即1940年4月拟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7月拟定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文件是西工委的同志在研究了蒙古、回回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以后起草的。其中关于团结蒙、回民族抗日，共求解放，共同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政策，是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

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结合这两个民族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西工委的大多数委员都参加了讨论，洛甫、李富春、王若飞、高岗等在讨论中讲了话。这两个提纲在中央讨论时，毛泽东指出，不仅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而且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提纲在正式发表时，增加了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内容（“狭隘民族主义”这个词，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后改用“地方民族主义”）。

这两个文件最初分别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和第九期。发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说：“这是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提纲，特发表于此，作为对回回民族问题的原则指示。”另一个提纲在发表时，也有类似的按语。按语表达了党中央批示的精神。这两个提纲后来收入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汇编（上册），作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之一。

两个提纲的基本内容如下：

1. 分析了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的特征，对于回回，肯定它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少数民族”。揭露国民党政府认为回族已经汉化，回回就是回教徒，否认回族是一个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谬论和政策。在西工委内部，个别同志开始对此也存在模糊认识，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很快取得了一致。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这是我们做回回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对于蒙古族，指出它“在政治上现在是非独立和不统一的，是帝国主义或异民族的附庸”。“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才有可能”。

2. 分析了民族问题中的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回、蒙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裂活动”，妄图建立“回回国”。日本帝国主义还提出“日蒙联合”、“共同防共”等口号，建立傀儡政权——伪“蒙疆自治政府”，策动“以蒙治蒙”。其目的是要灭亡回、蒙民族，进而灭亡整个中华民族。第二是回、蒙民族和汉族的矛盾。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回、蒙民族对汉族上层统治者的深刻仇恨，反过来又滋长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日本帝国主义把利用回、蒙民族同汉族的矛盾作为它灭亡回、蒙民族的主要政策。第三是回、蒙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回、蒙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争取回、蒙民族，包括其一部分上层，共同

团结一致地进行抗日战争。

3. 分析了争取和团结回、蒙民族参加抗日的可能条件，规定了党对回、蒙民族的具体政策。在提纲中，对回回民族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对蒙古民族提出了九条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唤醒和提高回、蒙民族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在政治上与汉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开放民主，保障回、蒙民族人民（包括抗日的上层贵族）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护清真寺、喇嘛庙；帮助改善和提高回、蒙民族人民的生活；帮助建立回、蒙民族自己的武装和组织抗日军队；实施抗战教育，培养回、蒙民族自己的抗战建国人才；帮助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回、蒙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之间的抗日团结。这些政策是党对少数民族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以后我们党就是根据这些政策争取和团结了回、蒙民族人民，包括一部分上层王公贵族，参加到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在抗战中的团结。

（三）我对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特点作了一些研究

到陕北以后，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但是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则是在西工委工作期间开始的。1940年初，作为我对回回民族研究的初步成果，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一篇叫《回回问题研究》。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回族的历史和特点，我们党的民族平等、联合的政策和回族的出路。

《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①研究了三个问题：

1. 追溯了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元时回回进入中国，开始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中国的回回，主要的就是蒙古军征服西域时被蒙古军俘虏或跟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氏”。“他们散至中国各地”，以“居甘肃者为最多”，逐渐形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其发展有以下特征：（1）“回回在元朝，已经大部分脱离了行伍的生活，定居在一定的地

^① 原载《解放》第一〇五期和第一〇六、一〇七合期。

域，从事耕种，发展了农业以及手工业与小商业，成为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在明末，回族中已开始地主和农民间的对立。”（2）“由于回回在更广泛的地区与汉族长期杂居，并且已经有上层分子参加统治民族的政权。”（3）“回族在开始进入中国时，就已经是被压迫的。但是由于对元、明两朝开国建国有功，他们在一个时期中，还能保有经济上、文化上和宗教上比较顺利发展的条件。”

2. “满清——最黑暗的民族牢狱时代的回族”。“在整个满清时代，回族因为不堪于统治者压迫，曾举行过多次的起义和‘反叛’。但每次起义和‘反叛’，都被满清统治者用武力‘剿平’了。回族每一次失败，便遭受一次严重的屠杀和摧残。但是，无论怎样的摧残和屠杀，都不能消灭回族的反抗”。“回回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顺治四年，米刺印、丁国栋的起义，坚持达两年之久。最后“军民五千余全被清军杀光。开始了满清血洗回族的第一页”。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事件和田五事件，由新老教的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发展为反满斗争。满清统治者对起义的回民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进行了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同治年间的回族革命运动，地区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各省，时间从咸丰末年至同治十一年，延续达十一年之久。太平天国的胜利推动了回族革命的胜利，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影响了回族革命的失败，成千成万的回民死于左宗棠清兵的刀下（当时的研究还不知道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云南回族领袖杜文秀为首的主张和实行回汉联合的起义事件）。所有这些义举，虽因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都失败了，但其在回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在这些斗争中，满清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制造回汉矛盾，挑动相互屠杀，造成回汉之间的长期仇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3. “辛亥革命以后的回族”。指出辛亥革命并未消除回汉对立和解放回回民族。重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并实行民族平等、根绝大汉族主义的原则。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要求全国各民族进一步团结抗战，“只有坚持抗战，才能给中华民族和回族的解放事业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此文后来收入《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的第二章。我还为该书写了序言。

《回回问题研究》^①写了八个问题：一、回回的来源。二、回回的社

^① 原载《解放》第一〇九期。

会经济状况。三、回教。四、回回的革命传统。五、空前的民族危机与回族当前的出路。六、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七、实行民族平等的办法。八、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传统，纠正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最后作了如下“简短的结论”：（1）“回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在汉族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弱小民族”。（2）“回族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显明，但这种矛盾没有超过回族同汉族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常把社会矛盾推在后面。”（3）“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在某些点上促进了回族的汉化”，也积累了民族的仇恨。（4）“回教在一定意义上是回人结合而为民族的‘绳索’，是回族团结奋斗的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进步、民族觉醒与社会觉醒的障碍，且成为内部和外部野心家利用的工具”。（5）“半殖民地中国的境遇，使回族遭受着两重民族压迫：帝国主义的和汉族统治阶级的。在目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东北、华北的沦陷区已成为殖民地，把回日矛盾提到第一位上来。回回民族斗争的锋芒，首先要针对着日本侵略者。回回人民应该坚决反对自己民族内部的投降主义与分裂危险。”（6）“为了巩固回汉的联合，为了坚持抗战，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应该立即终止民族压迫，具体的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7）“回族解放同中华民族解放不可分离，只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回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真正的自由。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里，回族同其他各民族一样，有自由的发展道路与光明的发展前途。所以，回回人民需要积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8）“在回回问题上，应该根绝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应当纠正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当时西工委除研究民族问题外，还研究青红帮问题，由刘庚负责。这对争取国民党地区青红帮成员拥护党的抗日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

培养民族工作干部，主要是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也培养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这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为此目的，1937年我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办过一个少数民族班，有藏族天宝（桑吉悦希）、扎喜旺徐、孟特尔、罗德干、沙拉（姑姑），彝族王占青、王占

有、潘占云、田雨清、李木林，苗族徐忠义等参加学习。1939年至1940年，除在中央党校办过一个回民班（第三十七班，负责人是马青年）外，在西工委还集中了天宝、扎喜旺徐、孟特尔、沙特等一些藏族青年骨干分子，由何承华等给补习汉族的古文和现代语言。1939年陕北公学成立了蒙古青年队（即五十五队）。1940年8月7日，后期陕北公学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有学员三十人，全是少数民族的同志，设有政治理论课（占百分之四十）、艺术课（各民族自己的艺术，占百分之四十）和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占百分之二十），学习期限一年。在此基础上，1941年6月30日又成立了民族部，主任王铎。第一次招生一百八十五人，除了蒙、回、藏、彝、苗、满六个民族的学员以外，还有少数汉族同志。在民族部举行开学典礼时，我应邀参加，并讲了话。我说，创办民族部，团结如此众多的各族同志于一处，借此沟通与交流民族文化，学习解放本民族的科学道理，不仅在边区，即使在全国也属创举。

随着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来延安的民族青年越来越多。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于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民族学院，院长高岗兼，副院长高克林。内设教育处，管理教育工作；民族问题研究处，分设蒙、回、藏三个民族问题研究室；以及总务处和干部处。第一次招收蒙、回、藏、苗、彝、满、汉等各族青年三百多人，其中蒙族占百分之四十、回族占百分之二十、藏、彝各占百分之四，并有女学员三十二人。按民族和文化程度的高低，编为四个班。学程三期，每期二年，共六年。到1942年上半年，有六个班和一个研究生班，共七个班。学制在实践中也不固定，有三年半的，也有学完六年的。1944年民族学院迁到定边。1945年有一部分迁到伊克昭盟的城川，至1948年春结束。它是我党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场所，为党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者。

四、组织少数民族的抗日救国团体

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促进边区回民文化，1940年1月，由西工委组织八路军政治部金浪白，马列学院马文良，中央党校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西工委牙含章，

以及女大的苏冰等，共同发起“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在延安的全体回民，以及邓发、李卓然、徐以新和边区政府的代表等。这次成立大会是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自己抗日组织的一大盛举。回族同胞和汉族同志的讲话一致强调回汉之间的抗日团结。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全国回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最后公推金浪白、马文良、马寅（陕公）、马青年、苏冰五人为理事，正式宣告“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成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

1940年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谋，成为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为促进全国回民的抗日运动，巩固全国的抗日团结，粉碎日寇对回回民族的挑拨，以及争取回回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解放，特发起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这一名称是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的，是为了同国民党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生关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扩大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斗争的影响。因国民党不承认回族，称为回教，我们也用了这一名称。边区独自的回民组织，则统称回民）。

1940年10月7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暨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边区各分区的回民代表和在延安的全体回民。朱德、王明、洛甫、高自立、谢觉哉以及各机关的代表一千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由定边马阿訇主持，按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大会讨论了争取回族在全国的平等权利与抗日团结、边区回民的任务和对保卫边区和发展边区经济以及边区回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提高等问题。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干事，干事长鲜维峻，副干事长金浪白，宣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1941年春，关中、陇东三边各分区也相继成立回协支会。分会和支会在边区回民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对推动西北地区的回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揭露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回回国”的阴谋；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推动边区回民发展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五、交流和促进民族文化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此后，边区就开始筹备成立蒙、回民族文化促进会。

一、关于蒙古文化促进会。先是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有：吴玉章、林伯渠、高自立、王若飞、李卓然、艾思奇、杨松、冼星海、柯仲平、罗迈、贾拓夫、柯敬史（柯庆施）、许光达、冯文彬、张琴秋、李富春、丁玲、刘春、白如冰、周扬、曹力如、肖三、肖劲光、肖向荣、蔡若虹、莫文骅、赵通儒、张庚、张目、师田手、高阳、乌勒图那素图、杜矢甲、巴彦图、巴布尔多计、阿拉腾扎布、李初黎等三十九人。1940年3月31日，蒙古文化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有蒙、汉、藏、回各民族同胞和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千余人出席。会上，艾思奇作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的报告。我在会上讲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任务，提出四点：一、对蒙、汉两民族之间历史上遗留的误会和仇恨，要进行多方面的解释工作；二、在蒙古同胞及全国人民面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企图分裂蒙汉团结的阴谋；三、要严厉批判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四、根据蒙古民族通俗的文化形式进行启蒙运动。

这次大会推举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沙克都尔扎布（即沙王、伊克昭盟盟长）等为蒙古文化促进会名誉理事，推举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罗迈、乌勒图那素图、阿拉腾扎布、巴彦图等三十五人为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主任吴玉章。

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以后，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决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

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有一座成吉思汗墓，是衣冠冢，地点在依金霍洛。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绥远后，妄图抢走成吉思汗的灵柩（长方形的银棺，长约三尺余）。1939年5月，为保护成吉思汗灵柩的安全，免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蒙族同胞决定将灵柩移到后方（甘肃的兴隆山）。灵柩在迁移过程中途经延安，延安党政等机关为了加强蒙汉团结，联合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成吉思汗祭典。6月18日，在十里铺设迎灵办公处。

21日，成吉思汗灵柩到达十里铺，谢觉哉（代表中共中央）、柯敬施（柯庆施、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滕代远（代表八路军总部）、王若飞（代表八路军联络部）、莫文骅（代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高自立（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国民党肤施（延安）县党部、县政府高仲谦等和各族群众近万人在十里铺迎灵、祭典，主祭谢觉哉，曹力如（边区政府秘书长）读祭文。摘录如下：“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噉然反共，实则残民，满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蜂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营，抗战到底，大义是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磨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捋。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

从此以后，每年春季（旧历三月二十一日）、夏季（旧历六月二十日）就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以此来提高蒙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蒙族人民的抗战热忱。1940年夏季，由毛泽东、朱德亲自发起公祭，朱德、吴玉章、董必武、高自立和我都参加了。这次祭典在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祭典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的落成典礼。“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字是毛泽东的手书。此后，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就成了边区蒙族同胞的主要活动场所。

二、关于回民文化促进会。与蒙古文化促进会同时进行筹备。筹备委员有：谢觉哉、罗迈、张仲实、艾思奇、莫文骅、马阿訇、马青年、贾拓夫、刘春、马文良、鲜维峻、金浪白、马寅、牙含章、吴玉章，邓发、林伯渠、高岗、李富春、肖劲光、周扬、丁玲、王若飞、吕骥、张邦英、曹轶欧、曹力如、刘景范、胡乔木、柯庆施、赵毅敏、金茂岳、杜矢甲、习仲勋、马文瑞、白志民、王维舟、马海德、苏冰等。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同时召开，选举林伯渠、高岗、谢觉哉、周扬、张仲实和延安的马阿訇、定边的马阿訇、三岔的马阿訇、关中的马阿訇等三十余人为理事。

创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目的，都是为了沟通蒙、回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帮助发扬蒙、回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创造与发展

蒙、回民族的新文化，促进蒙、回、汉各族人民的进一步团结，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事业。这是当时西工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前后，蒙、回文化促进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组织人员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部分著作翻译成蒙古文、阿文，并出版发行。

六、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

在由西工委起草经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分别规定了“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帮助蒙古民族的抗日军队，组织与强大抗日的武装”和对蒙、回民族的军队实行与其他军队享有同等的待遇，提高他们抗日救国的政治认识，扶助其民众的抗日武装等方针政策。

1938年农历十一月、1939年农历四月和1941年农历四月，宁夏海固地区的回族农民因不堪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先后在马国瑞、马国磷、马银贵、马喜春、马思义（马喜春的大儿子）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马国瑞等领导人也先后惨遭杀害。在第三次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马思义决定投奔陕甘宁边区。1941年农历六月初六，起义军二百多人在马思义等人的率领下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庙儿掌。当起义军进入边区以后，得到了边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代表党组织首先接待了他们。但国民党对进入边区的起义军仍不放过，竟入侵边区来消灭这支起义军。在我八路军环县保安大队的援救下，起义军才免遭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保护这支起义军队伍，党把他们安置到离国民党统治区较远的合水柳树沟，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和照顾。

1941年7月，党为了教育这支回族农民起义队伍并培养其干部，特意安排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思义、马智宽等到延安参观。同时派鲜维峻代表边区回协去陇东慰问起义部队。参观期间，毛泽东接见了马思义、马智宽等，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共产党一定要支持和帮助回族人民争得自由和解放。并向他们保证不编散起义军队伍。朱德总司令、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等也接见了马思义，各次接见都由杨静仁陪